



第五任夫人： 这个“丑陋”的柏杨

文 / 本报记者 金丹丹

“天下只有一件事，虽经过沧海桑田，天翻地覆，千讨论万讨论，讨论到世界末日也讨论不完的，那就是男女之间的爱情。”

88岁的柏杨和68岁的夫人张香华，结婚30年讨论出的结果是什么？

男在左：了解女人，比了解上帝都难。

女在右：看，这个丑陋的中国人。

柏杨“妻子们”的准确数字是几个？

《男左女右》是柏杨和张香华的旧作合集，收集了两人对婚姻、爱情的探讨，共15万字，约50篇文章。柏杨的经历非常坎坷，“十年小说、十年坐牢、十年杂文、十年著史”，感情生活也一波三折，他以一贯的大气和幽默畅谈对婚姻与爱情的认识，而有“国际桂冠诗人”称号的张香华则以她细腻、婉约的语言与丈夫共同探究“囫囵吞枣，无法分析”的婚恋人生。已宣布封笔的柏杨还特地为新书写了序。

在两人的文字之中就能强烈感觉到男女与生俱来不同。不吵架，就是好夫妻？离婚一定是悲剧？初恋是不是最美？夫妻间是不是要绝对地诚实相处？爱的价值到底如何？柏杨的人是不是跟他的笔一样的锋利？和柏杨这样一位“是非边缘”的人物结婚，是否大胆冒险？柏杨“妻子们”的准确数字是几个？

书中还有近60幅柏杨夫妇的生活照片，绝大部分首次在大陆公开出版。张香华这样说，虽然两人都拿笔杆子，但是各自的世界完全不同，外界对柏杨的另一面很好奇，所以就有了本书，希

望年轻读者看看老一代人是怎么走过来的。

原来是“第五任”

张香华是1978年嫁给柏杨的，谈起结婚三十年间的感想，她说，婚姻不过是要懂得“算数”，把遇到的大小事“加减乘除一番”。这几年，因为柏杨身体不好，张香华大部分时间都在照顾丈夫，只写了三首诗，而性格也在磨砺中改变不少，“我早就被柏杨磨得没有一点脾气了。”

书中有这对老夫少妻的很多好玩故事。比如《妻子们》一文讲的是这样一件事儿，当年张香华作为第三任妻子嫁给柏杨，两岸互通后，结婚第二年，家里收到信件，张香华发现两封信的称呼截然不同，一个是“亲爱的爸爸”，另一个是“父亲大人”。于是她问柏杨：“你不会有五个夫人吧？”柏杨说：“你就是第五任夫人啊。”张香华这才知道自己是“第五任”。

【节选】

看，这个丑陋的中国人

柏杨是一个既浪漫又实际的男人，只是，他常把浪漫和实际的时间、地点颠倒而已。

作为柏杨的妻子，观察柏杨，把焦距拉得太近，跟拉得太远一样，恐怕和真相都不相符。

认识柏杨之前，听到他的名字，就心惊肉跳，想象中他是一位坐过九年多政治牢，手持钢刀，吞吐利剑的人物，和他交往，就像鸡蛋碰石头，不可能有共同语言。可是，认识之后，他给我的印象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。他谈吐温婉有礼、身体健康、性情爽朗，我甚至觉得他聪明敏捷、机智幽默，几乎囊括我所有赞美的形容词。所以，有一天当我嗫嚅着说：“我不知道能给你什么，你才从牢狱里出来，不能再受任何打击……”柏杨的反应像闪电一样快，他说：“我从不怕任何打击！”这句话使我一振，几乎就在同时，我已决定要嫁给他。也从他这句话的反应，使我以为他的语言精彩，生动感人。

可是，结婚后这十几年，最令我紧张的，却正是他的语言表达力——尤其是在讲台上时。每次，听他把一个生动的主题，叙述得冗长拖沓，恹恹欲睡；或将一个可以深入的命题，唏哩呼噜，轻松带过，我都急得两眼干瞪，恨不得跳上台去替他讲。有一次，柏杨应邀在台北金石堂演讲，又犯了松散的毛病，好不容易挨到终场，热情的听众仍不断地举手发问，我也拼命举手，陪我同去的朋友惊讶地问：“你也要提问题？”我答：“我不是要提问题，我是要他快点下台！”从此，我尽量避开他的演讲，连1984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，他那场后来轰动海峡两岸，造成无比震撼文化反思的《丑陋的中国人》讲演。当时，我就不在场，原因是我对他的演讲，一直抱着一种态度：一个人丢人，比全家丢人好。

自从他着手翻译《资治通鉴》这部巨著，一天之中，柏杨除了吃饭睡觉，几乎全部时间都埋首伏案，他那性急的脾气，全部反映在他日常生活的言语上，常常把句子的文法结构打散，只使用象征性的几个词，有点像电报。例如，他对他的助理小姐说：“明天，书好，校好对，没问题，早打电话。”我就得替他翻译，柏杨说的话全文应该是：“明天早上，先把散放在地上的书，收拾回书架上，然后开始校对工作，校对完，尽快打电话告诉出版社来拿稿。”诸如此类，有时连我也不得要领，只好懊恼地大叫：“你怎么话都说不通？”

这时，他无奈地看着我，暂时歇笔长叹：“笨哪，怎一个笨字了得！”

作为一个丈夫，柏杨这个男人心胸真是够开阔大方的。他曾对我说：“你如果想和别人跳舞，就去跳舞。”因为我对跳舞的兴趣不高，所以，并没有放在心上。有一年，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发行人黄锦西先生邀请我们到新加坡访问，到达的当晚，有盛大宴会，宴会中途，不知何故，柏杨灵机一动，忽然公开征询有没有人愿意带他的太太去夜总会跳舞。一时

全场哑然，没有一个人反应。不过，令我更生气的事还在后头。下一站在吉隆坡，接受记者访问时，有人问他婚姻中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，他的答案竟是奇特的两个字：“金钱”。事后，他向我解释他之所以这样答，因为，爱情当然重要，跟空气一样重要，没有空气，人就活不了，但，谁会说空气是婚姻中最重要的条件？而人心中都知道金钱重要，却没有人肯这么直率地谈这个问题。可是，他向我解释没有用，因为记者已替他在报上解释了，认为是柏杨自己的婚姻经验。我的结论是：柏杨是一个既浪漫又实际的男人，只是，他常把浪漫和实际的时间、地点颠倒而已。

柏杨每次被我奚落，就自我解嘲地说：“仆人的眼中没有英雄。”我马上提醒他，这话只适用于柏杨与熊熊——我们家的宠物，是一只灰溜溜的暹罗猫。它从出生一周，就入籍我们家，原是柏杨送给我结婚纪念的礼物。由于它特立独行的性格，谁的账也不买，常常在柏杨埋头写作之际，“笃”的一声，跳到稿纸上，无论怎么赶，它都不走，好像是抗议说：司马光比得上我熊熊重要吗？再看熊熊心目中的“英雄”柏杨是怎样的？每当熊熊盘踞书桌，柏杨只好委屈地把稿纸挪到老早因堆满书籍，而狭窄得可怜的书桌一角，偷偷摸摸地继续奋笔直书，直到熊熊厌烦了这种沉闷单调的游戏，才一耸身，悻悻然走开。

在日常生活中，柏杨的记忆力几乎等于零，不久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，我趁假日离家南下两天，柏杨一人留守家中，结果因为遗失了钥匙，请来锁匠，偏偏我们家用的是顽固的耶鲁锁，最后不得不要领，只好破门而入，却发现钥匙并不在家。还是社区餐厅的服务生，拾到一件客人遗留下的夹克，发现口袋中有一串钥匙，辗转追寻，终于想起是柏杨一个人去餐厅吃饭时遗落的，一场长达四小时的总动员闹剧才算收场。

尽管柏杨的记忆力不佳，但他却记得英国幽默大师萧伯纳的一个笑话，那就是，只有萧伯纳太太一个人对萧伯纳的笑话，不觉得好笑。柏杨充满同情地说：“可怜，萧伯纳的太太对萧伯纳说的每一个笑话，都听过一百次以上。”我告诉他，我可没有萧太太的好耐性，你的笑话，我听第二遍就嫌多了。

有一次，不晓得为了什么事，我大发脾气，恶狠狠地凶了柏杨一顿，过了一会儿我自己忘了，到柏杨书房去巡视，看见他垂头丧气坐在椅子上，一动也不动，我问他怎么了？他说：“你一生我气，我觉得做人都没有意思了。”霎时间，我眼前这个男人——柏杨，变成了一个孩子，我的心完全被软化了，我悄悄俯身下去，告诉他，我刚才的视觉有毛病，调整一下焦距就会好。其实，我还没有把藏在内心的话说出来，那埋藏在内心底处的一句话——柏杨，我爱你。